

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外交互动的机制及其特征

董晓佳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2)

摘要: 罗马帝国晚期, 帝国与周边“蛮族”存在着长期而广泛的外交互动。在这种互动中, 罗马皇帝与“蛮族”首领或国王一般扮演着中心角色, 双方共同构成了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外交互动的轴心。与此同时, 罗马帝国的地方官员、边疆将领、主教以及“蛮族”政权的将领或官员均是外交活动的参与者, 他们的通信与谈判一方面构成了双方外交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 其效果与效力由于缺乏权威而受到限制。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进行外交互动时的核心特征为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并存。在大多数情况下, 双方的外交互动体现出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 但理想主义外交不时对帝国命运与历史进程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 晚期罗马帝国; “蛮族”; 外交机制

中图分类号: K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5)01-0216-12

晚期罗马帝国(Later Roman Empire)^①及其后继者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长期处于外部威胁之下, 因此, 处理与周边“蛮族”关系的方式方法就成为罗马-拜占庭帝国不得不给出的答案。在罗马世界, 并不存在当今各国管理相互关系的各种方式, 以及在保持和平、文化交流、经济、贸易与战争等事务上起辅助作用的国际机制与组织, 既没有促进自身在国外的利益或对于身处国外的公民提供援助的海外常驻代表或官僚机构, 也没有外交部或专精外交事务的国家官员, 首都也没有任何国外常驻代表^{[1][4]}。正如学者在讨论拜占庭帝国对外关系时所指出的, 在近代之前的欧洲, 民族国家尚处于形成过程中, 国家概念较为淡薄, 因此, 在拜占庭帝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或“对外关系”概念, 也不能用当代关于外交与外交官员的概念去理解拜占庭帝国的相关问题^[2]。晚期罗马帝国同样如此。然而, 无论是罗马帝国的早期阶段还是晚期阶段, 帝国与周边“蛮族”族群或政权之间确实存在着可以用“外交”一词形容的联系。虽然与近现代以来的外交存在极大差别, 但是帝国与周边“蛮族”族群或政权在处理彼此间的经济、政治、军事、宗教等问题时, 需要通过各种联系方式澄清各自立场并达成双方认可的协议或处理方式。对于东罗马帝国而言, 即使是最好战的皇帝, 也更喜欢通过外交艺术而非武力实现其政治目标^[3]。某位皇帝“好战”与否较难精确度量, 即使是在战争时期, 晚期罗马帝国皇帝与周边“蛮族”的统治者也从未放弃外交互动。

具体到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的外交关系, 学者多注目于如阿拉伯人(Arabs)^{[4](29-40)}、哥特人(Goths)^{[5](105)}等单个“蛮族”群体与帝国在特定时间段或事务中的外交联系, 而针对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外交互动的具体机制与普遍特征的研究, 仍有待进一步强化。有鉴于此, 本文拟梳理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的外交互动机制及其主要特征, 以期抛砖引玉。

收稿日期: 2023-11-06; 修回日期: 2024-02-24

基金项目: 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关系研究”(19ASS002)

作者简介: 董晓佳, 男, 江苏南京人, 历史学博士,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环地中海—拜占庭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拜占庭史、晚期罗马帝国史, 联系邮箱: dongxiaojia2002@163.com

一、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外交往来的机制

第一，帝国与周边“蛮族”保持着长期双向往来，形成了常态化外交活动。早在共和国时期，罗马人就与周边“蛮族”保持着程度不一的外交往来，进入帝国时期的罗马仍然保持着这一传统。第一位元首奥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27年—公元14年在位)在遗嘱中多次炫耀他的外交成就，如基姆布利人、卡里德斯人、塞姆诺尼斯人以及其他日耳曼人部族都曾通过使节到罗马寻求友谊；巴斯塔奈人、西徐亚人、萨尔马泰人等均派遣使节向罗马表示友好，之前从未出现过的印度使节也经常前来。此外，他还曾成功迫使帕提亚人向罗马人乞和^[6]。

4世纪，教会史家尤西比乌斯(Eusebius)在歌颂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306—337年在位)时，也曾以相似的手法夸耀后者。尤西比乌斯宣称所有“蛮族”的大小首领、总督和国王都向君士坦丁一世致敬，并派遣使节呈上礼物^{[7](70)}；赞美皇帝用理性的谈判让哥特人臣服，将他们从没有理性的野兽般的存在转变为理性与守法的存在^{[7](155)}。在一段夸张的文字中，尤西比乌斯宣称不断有携带贵重礼物的使节来到帝国，以致“蛮族”在宫殿门外成行结队地等候接见。这些使节从发式肤色到装束各不相同，其中包括布勒米耶人、印度人与埃塞俄比亚人。使节带来的礼物有金冠、用宝石制成的冠冕、金发的孩童、以黄金编织的衣物、马匹、盾牌、长矛、标枪和弓等；皇帝同样回报以礼物，以致使者立即变得极为富有^{[7](155-156)}。尤西比乌斯还提到，波斯君主也为取得君士坦丁一世的承认而遣使寻求缔结友好条约^{[7](156)}。

上述叙事或许出于政治宣传的夸大与粉饰，尤西比乌斯很可能将冒充使节的“蛮族”商人带来的商品描写为外交礼物，将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进行的贸易活动曲解为“蛮族”的臣服。奥古斯都式自我赞颂与尤西比乌斯式吹捧的共同特征是，无论“蛮族”使节或是慑于皇帝威名前来表示友好与臣服，或是在帝国的压力下遣使求和，这些外交活动都是“蛮族”主动而为的，是不同地区与族群的使节涌向帝国求得谅解、承认或是财富，从而显示帝国在与周边“蛮族”交往时拥有居高临下的超然地位。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当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即使是从晚期罗马帝国史家留下的记载来看，帝国与周边“蛮族”的外交往来也并不顺利。在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的外交互动中，帝国并不始终占据优势与中心地位。

第二，在3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的晚期罗马帝国，随着中央集权官僚体制与君主专制制度的不断发展，皇帝位居国政事务的中心，在与周边“蛮族”的外交往来中，同样占据核心地位。

虽然晚期罗马帝国没有外交部，但是除了各种使节或是边疆官员的临时外交活动之外，在中央政府内确实存在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其中最重要的是执事长官(magister officiorum)。执事长官是晚期罗马帝国最重要的官职之一，其所担负的职责包括外交事务。执事长官负责接待外来使节与掌管通事，并安排使节使用公共驿站前往首都^{[8](30)}。执事长官是对外交往尤其是使节来访相关事务中最重要的负责官员，具体事务需要依靠执事长官下辖的人员处理。除了通事之外，其中最重要的是秘密稽查使(agentes in rebus)与觐见处长官(officium admissioinum)。

监督与管理公共驿站是秘密稽查使的主要工作之一^{[8](31)}。根据4世纪史家维克托尔(Aurelius Victor)的说法，这一职务设立于戴克里先时代^{[9](30)}。357年诏令规定，秘密稽查使监督公共驿站的运营，并要求在每个行省中设置两个秘密稽查使管理公共驿站^{[10](145-146)}。359年诏令确认秘密稽查使是公共驿站的直接监督者与管理人^{[10](21)}。395年诏令提出应当向每个行省派遣一名秘密稽查使监管公共驿站^{[10](147)}。外来使节进入帝国境内后，在使用公共驿站的服务前往首都的过程中，由秘密稽查使监督与护送。

觐见处在君士坦丁一世时期就在执事长官管辖之下^{[11](28)}。觐见处的职责是安排申请者与皇帝会面。

负责具体引见工作的觐见员(admissionales)由觐见处长官(magister admissionum)管理^{[12](582)}。向觐见员发放任命书则由执事长官下辖的另一部门文书处(scrinium sacrarum libellorum)负责^[13]。在晚期罗马帝国,觐见处是具体负责皇帝与觐见者会面的官署,所有人员觐见皇帝均由觐见处长官安排^{[11](35)}。外来使节觐见也不例外^[14]。除了皇帝身处战场或皇帝与“蛮族”首领直接会面以外,使节觐见在程序上必须经由觐见处负责官员的安排^[15]。

由此,晚期罗马帝国形成了以皇帝为顶点、多部门共同参与的使节来访机制。使节行经的公共驿站由执事长官下属的秘密稽查使监管。使节觐见由执事长官下辖的觐见处长官安排,并由该部门管理的觐见员具体执行。觐见员的任命由执事长官下属的其他部门确认。执事长官本身直属于皇帝。这样一种机制甚至影响了模仿罗马帝国政府体制的东哥特王国。东哥特王国执事长官的职责继承自晚期罗马帝国,不仅负责掌管公共驿站,还负责接待与引见外族使节等对外事务^[16]。

第三,在帝国与“蛮族”的外交活动机制中,首脑与特使外交占据着重要地位。在晚期罗马帝国,“蛮族”盟友首领时常到访帝国首都。381年,与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 379—395年在位)结盟的哥特人首领阿塔纳里克(Athanaric)到达君士坦丁堡并受到皇帝的热烈欢迎^{[5](154)[17](91)[18](72-74)}。5世纪时,阿拉伯酋长阿莫尔塞苏斯(Amorcesus)希望成为帝国盟友,派遣一位主教觐见皇帝利奥一世(Leo I, 457—474年在位)并陈情,皇帝立即邀请酋长前来君士坦丁堡并亲自接待^{[19](407)}。查士丁尼一世在位时期,拉奇卡(Lazica)国王、赫鲁尔人(Heruls)酋长与克里米亚匈人(Crimean Huns)首领都曾经受邀来到君士坦丁堡^{[20](16)}。

皇帝不仅时常接待使节或“蛮族”首领来访,也常派遣使节拜访“蛮族”首领。如君士坦丁一世致萨珊波斯(Sasanian Persia)君主的亲笔信^{[7](156)},就是由皇帝的使节送往波斯的。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 337—361年在位)曾向阿拉伯人派遣使节^{[21](40)}。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致波斯国王沙普尔二世(Shapur II, 309—370年在位)的和谈信件由普罗斯佩(Prosper)、斯佩克塔图斯(Spectatus)与尤斯塔修斯(Eustathius)组成的使团递交^{[22](337-339)}。在该使团失败归国后,卢奇里亚努斯(Lucillianus)与普罗柯比(Procopius)又奉命继续出使波斯^{[22](403)}。史家奥林匹奥多鲁斯(Olympiodorus)曾出使匈人^{[19](183)}。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 408—450年在位)时代,贵族塞纳托尔(Senator)奉命出访匈人统治者阿提拉(Attila)^{[19](237)}。史家普里斯库斯(Priscus)参加的使团除了公开的外交任务,还担负着刺杀阿提拉的秘密使命^{[19](245-247)}。普里斯库斯所属使团在路途中巧遇西罗马帝国政府派遣的出访阿提拉的使团,成员包括伯爵罗穆鲁斯(Romulus)、总督普罗莫图斯(Promotus)和将军罗曼努斯(Romanus)^{[19](263)}。在普里斯库斯所属使团的任务失败后,君士坦丁堡政府又派遣御前军事长官(magister militum praesentalis)安纳托里乌斯(Anatolius)与执事长官诺姆斯(Nomus)出访,希望平息阿提拉的愤怒^{[19](297-299)}。

帝国政府主动向外派遣使节与周边“蛮族”使节前来帝国同样频繁。根据学者统计,在公元300年至565年间,帝国向外遣使共计79次,几乎达到每三年一次的频率^{[20](31)}。鉴于年代久远以及记录缺失,上述统计不可能涵盖帝国政府的所有遣使行动。同时,由于史家关注重点与叙事方式的不同,遗留至今的遣使记载必然无法反映该问题的全貌。如前所述,史家普里斯库斯本人就是使团成员,他不仅详尽描绘了使团的目的与行程,还附带记录了其他三次使团的情况。因此,在其著作中出现了较为集中的遣使记录,有的(如西罗马帝国派至阿提拉处的使团)甚至是现存唯一的文献记录。此外,从普里斯库斯的记载可以看出,在晚期罗马帝国,不同的政权或族群与帝国通过使节就某种实质性问题达成双方均能接受的协议相当艰难,往往要经过多次使节往返才有达成协议的可能。前述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与波斯国王的谈判可为旁证。即使从最保守的角度估计,上述79次的统计也必定大大低于晚期罗马帝国实际外派使节的次数。与此同时,出于不同目的来到帝国的“蛮族”使节也不在少数。例如,东哥特人(Ostrogoths)国王提奥德里克(Theoderic, 493—526年在位)就曾三次派遣使节团前往君士坦丁堡,希望东部皇帝承认其在意大利的统治地位,并最终在497年缔结条约^{[4](80-83)}。

就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外交往来的程序而言，当“蛮族”使节的目的地不是帝国首都或皇帝不在首都时，前述由执事长官及其下属部门负责的外交程序可以简化，从而实现首脑外交。其形式主要分为两种：一是皇帝身处战场时，可以直接与“蛮族”使节会面。如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与阿拉曼尼人(Alamanni)交战时，阿拉曼尼使节到皇帝军营与之秘密会谈^{[22](85)}。378年，皇帝瓦伦斯(Valens, 364—378年在位)在军营接见了哥特人使节团^{[23](465-467)}。二是皇帝可以在战场上与“蛮族”首领直接谈判。如369年，瓦伦斯与哥特人首领在多瑙河(the Danube)中的小船上会面^{[5](119)[24](117)}。

第四，在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的外交互动中，地方精英是外交事务的重要参与者。虽然皇帝是帝国外交事务的最高权威与中心，但是地方官员、驻军将领乃至地方非军政人员也可以从事外交活动。例如，朱利安(Julian, 361—363年在位)作为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副手负责高卢地区的防务时，曾与法兰克人(Franks)首领缔结和约^{[22](211)}。356年，东方大区长官穆索尼亚努斯(Musonius)曾经与萨珊波斯将领塔姆沙普尔(Tamsapor)谈判^{[22](241)}。瓦伦斯统治后期，阿拉伯人进攻帝国，当地驻军将领遣使求和^{[25](116)[26](374)}。382年10月3日，将领萨图尔尼努斯(Staturinus)与哥特人签订和约^{[27](85)[28](2)[29](456)[30](102)}。匈人首领乌尔丁(Uldin)入侵色雷斯时，地方官员与其谈判^{[26](422)}。阿提拉进攻意大利时，罗马主教利奥(Leo)率领使节团与阿提拉会谈^{[17](113)}。6世纪时，将领西塔斯(Sittas)与阿斯佩提亚人(Aspetiani)的使节会谈并缔结和约^{[31](273-275)}。萨珊波斯国王库思老一世(Khusrau I, 531—579年在位)进攻苏拉城(Sura)时，当地主教与库思老谈判^[32]。

第五，在晚期罗马帝国的外交机制中，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将承担最终责任。总体而言，与“蛮族”使节的来往以及重要协议的达成不是与皇帝直接相关，就是需要得到皇帝的最终认可，皇帝决定着对外事务的大政方针。虽然地方精英会不经请示就与“蛮族”会谈或因来不及请示而进行外交活动，但对外事务的最后决定权与管辖权归皇帝所有^[32]。

晚期罗马帝国最重要的对外条约均经由皇帝同意，皇帝与“蛮族”首领或政权正式签订的条约拥有最高权威。298年，萨珊波斯国王纳尔塞斯(Narses, 293—302年在位)在战争失败后与帝国签订和约，规定将一些领土割让给罗马帝国，该条约得到有效执行^[33]。363年朱利安战死于波斯，继任皇帝约维安(Jovian, 363—364年在位)与波斯签订和约，将298年和约中由波斯割让给罗马帝国的土地大部分交还给波斯，其中包括重要设防城市尼西比斯(Nisibis)。虽然尼西比斯居民极力反对移交城市，但无法抗拒皇帝的命令，尼西比斯以及和约所规定的其他地区被转交给萨珊波斯，当地居民的异议无效^{[34](533-535, 543-551)}。387年，帝国与波斯达成瓜分亚美尼亚(Armenia)的协议，这一协议得到遵守^{[35](28-30)}。424年，帝国与匈人签订的和约是由狄奥多西二世同意的^{[36](11-12, 40)}。439至440年间，帝国官员与匈人达成的协议得到了皇帝认可^{[19](227)}，此后更新条款的协定也需要皇帝同意才能生效^{[19](237)[36](41)}。532年，经由查士丁尼一世与库思老一世的认可，罗马帝国与萨珊波斯签订宣布“永久和平”的条约并结束了战争^{[31](207-209)}。帝国将领贝利撒留(Belisarius)与波斯将领的谈判^{[31](113-117)}无法结束战事；西塔斯与波斯将领之间的谈判虽然可以解除对一座城市的围攻^{[31](201-203)}，但无法终止整场战争。

正因为如此，外交活动的胜利与失败最终都归功于或归咎于某位皇帝。也由此，围绕某次外交活动或和约的签订，有时会形成对立叙事。前述与哥特人缔结的382年和约就是例证。383年1月1日，高官泰米斯提乌斯(Themistius)发表演说，赞颂皇帝为帝国带来光荣的和平^{[18](82-86)[37](205-207)}。索佐门宣布狄奥多西迫使“蛮族”求和^{[26](378)}。奥罗修斯(Orosius)认为，和约导致罗马人统治了哥特人^{[38](341-342)}。约达尼斯(Jordanes)宣称，该和约令哥特人与帝国军队合为一体^{[17](91-92)}。尤纳匹乌斯(Eunapius)则批评皇帝导致“国家的毁灭”^{[19](71)}。

410年罗马城的陷落是晚期罗马帝国历史叙事中最为著名的事件之一，该事件本身也与皇帝在对外事务中的最终决定权相关。西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Alaric)向西部皇帝霍诺留(Honorius, 395—

408年在位)遣使,要求帝国支付一笔黄金并交换人质,霍诺留拒绝^{[26](422)[27](118)}。此后,阿拉里克入侵意大利,并于408年11月包围罗马^{[26](422)[27](118-120)}。罗马元老院与阿拉里克谈判,同意缴纳5000磅黄金、30000磅白银作为赎金,并请求皇帝批准^{[26](423)[27](120-121)}。霍诺留同意协议后,阿拉里克解除了包围;后来霍诺留拒绝履行协议,阿拉里克再次围困罗马,罗马元老院因此第二次向皇帝遣使^{[27](122-123)}。与此同时,阿拉里克与帝国官员约维安(Jovian)谈判,要求帝国缴纳年贡,允许阿拉里克的追随者居住在威尼提亚(Venetia)、诺里库姆(Noricum)与达尔马提亚(Dalmatia),同时授予阿拉里克帝国最高军职^{[26](423)[27](124)}。得知霍诺留回复可以提供谷物和黄金但决不授予军职后,阿拉里克立即进军罗马^{[19](161-163)[27](124-125)}。进攻前,阿拉里克再次与皇帝谈判,不再要求军职,只要求让其追随者定居诺里库姆、帝国每年提供黄金与谷物并与皇帝结盟,但霍诺留再次拒绝,阿拉里克因此围攻罗马城^{[19](163)[26](423)[27](125-127)}。此后,阿拉里克迫使元老院立阿塔鲁斯(Attalus)为帝,并由阿塔鲁斯任命自己为军事长官(409年)^{[19](163)[25](158)[27](129)}。不久后,阿拉里克又废黜阿塔鲁斯,向霍诺留示好(410年7月),但在前往与皇帝谈判地点的途中遇袭,于是最终下令攻陷了罗马(410年8月24日)^{[19](157-165)[26](423-424)[27](129-131)[28](10)[39][40](161)}。

从上述事态的发展来看,在围绕罗马城命运进行的谈判中,可以见到“蛮族”使节、罗马元老院使节、皇帝使节参与以及统治者直接会面(未能成功)的复杂场景,但是谈判最终由于皇帝本人的强硬态度与反复无常而归于无效。即使罗马元老院与“蛮族”首领达成了协议,没有皇帝支持,协议最终没有效力。

综上所述,在晚期罗马帝国,以皇帝为首的帝国中央政府在与周边“蛮族”族群或政权的交往中扮演着中心角色,相应地,“蛮族”首领或国王也在其部族或政权与罗马帝国的交往中具有核心地位,双方共同构成了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外交互动的轴心。与此同时,晚期罗马帝国的地方官员、边疆将领、主教等也是对外交往的参与者,他们与“蛮族”的通信与谈判构成了双方外交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权威性不足,其效果与效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二、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外交互动中的理想主义色彩

10世纪的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 912—959年在位)在《帝国行政论》中告诫后继者,为了公共利益,一名统治者首先应当知晓每个民族以何种方式有利于或有害于罗马人^②,他们会以何种方式进行战争及如何战而胜之;其次,要提防“蛮族”贪得无厌与永不满足的性情及惯于无度地索取礼物;再次,要了解不同民族的具体情况,包括其起源、习惯与生活方式、居住地区的位置与气候、家园的地理状况与幅员大小;最后,要关注罗马人与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期发生的事件。君士坦丁七世的目的是让继承人知晓这些民族之间的区别,明白如何与他们谈判并且安抚他们,如何与他们进行战争并压制他们;在与“蛮族”交往时,上帝会保护皇帝;在上帝保护下,各个民族将向皇帝献上礼物,皇帝则会被“居于地上的各个民族”所跪拜;等等^[41]。

《帝国行政论》写作时距查士丁尼一世去世已近4个世纪,但仍然体现出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外交互动时的核心特征,即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并存。在君士坦丁七世看来,了解帝国周边族群与帝国关系的友好、疏远或敌对,各族群的特征与彼此间的区别,各族群与帝国的历史渊源等,都是在做与周边族群交往的准备工作。之后,与“蛮族”的实际交往包括谈判与战争两种基本方式,经过精心准备的谈判与战争会导致“上帝护佑”的帝国君临于其他族群之上的结局。

在这种思路中,最后的结局显然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化目标。即使将“居于地上的各个民族”限定在10世纪或更早时期的罗马—拜占庭帝国的知识、政治与军事精英所认知与了解的范围之内,其所谓帝国使用正确方法后,“蛮族”就会拜倒在皇帝面前的说法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幻想。

晚期罗马帝国外交互动中的理想主义色彩的第一个表现,就是这种“世界”帝国观念在上层社会中的普遍与长期存在。前述奥古斯都的自夸与尤西比乌斯对君士坦丁一世的赞颂就反映了这种“世界”帝国观念。

晚期罗马帝国的多神教徒与基督徒精英继承与发展了上述观念。信奉多神教的皇帝朱利安宣布,无数民族长期以来效忠罗马,出生于罗马之外的人也采用罗马的制度以及罗马的法律和习俗^[42]。多神教徒史家阿米安努斯宣称:罗马城在“世界”上拥有显赫地位,罗马命中注定与人类共存,并为人类确保永恒的和平;在罗马的青年与壮年时代,罗马人从“世界”各处带回桂冠与胜利;在进入老年时,罗马已经迫使众多“蛮族”俯首称臣;并且,罗马在各地都被承认为主人^{[22](37-39)}。

就基督徒而言,他们在叙事中努力将罗马帝国的“世界”统治地位与基督教信仰结合为一体。5世纪,基督徒史家奥罗修斯宣布,本可夺取一切的“蛮族”成了罗马帝国的保护者,原因在于罗马人的基督教信仰^{[38](37)}。当奥古斯都实现和平后,耶稣基督降临世间并列名于罗马的人口普查登记清册中,从而公开证明了奥古斯都是全人类的首领以及罗马人是“世界”之主^{[38](281)}。

随着帝国在西地中海世界的统治逐渐瓦解,上述叙事在5世纪的帝国西部地区逐渐出现变化。5世纪前期北非希波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对“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辨析^[43],即为这种变化的典型例证。5世纪中期高卢教士萨尔维安(Salvian)也认为,罗马帝国并没有得到上帝的特别青睐,罗马人明知善恶之分而依然作恶,比不了解上帝律法的“蛮族”更为邪恶^{[44](119-124)},罗马人因此受到上帝惩罚^{[44](203-204)}。

虽然在西地中海世界出现了这种变化,但是直至6世纪,在东部帝国基督徒精英阶层的叙事中,罗马帝国作为“世界”统治者的观念仍然广泛存在。查士丁尼一世时代的阿伽佩图斯(Agapetus)宣布,上帝将统治大地的权杖赐予了皇帝^{[45](99)}。皇帝被上帝授予了“世界”帝国^{[45](110)}。同时代东部帝国的另一位作者宣称,皇帝的统治目的是整个人类的救赎^{[45](148)}。在一位诗人的笔下,皇帝将各个民族都置于轭下,征服了无数“蛮族”^{[45](197)}。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论说有其存在的时代、知识与政治背景,并不意味着帝国与周边“蛮族”外交互动的行为模式完全以理想主义为基础。因此,这种理想主义的鼓吹者或其目标受众会批评未能实现理想的皇帝。例如,尤纳匹乌斯抨击约维安将尼西比斯交给波斯人^{[19](47)},阿伽赛阿斯(Agathias)批评查士丁尼一世在晚年不再用武力打击“蛮族”^{[46](149)}。就理解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的外交机制而言,真正的问题是,这种理想主义宣传是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统治者的决策。

一般而言,绝大多数人总是生活在某个群体之中并与群体中的其他个体拥有各种联系。就生活于群体中的个人而言,群体传统与思维方式会对个体造成长久及潜在的影响。如果认为绵延数个世纪的理想主义叙事对于其接受者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或者不会以某种方式影响现实政治的话,就低估了思想或思维定式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在晚期罗马帝国精英阶层内部,上述理想主义表述众所周知。在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的外交机制中,皇帝居于核心,重大外交事务一般由皇帝做决定。如果受到理想主义潜移默化影响的统治者无法保持冷静,理想主义观念就可能影响皇帝的现实决策。

判明理想主义是否在罗马皇帝的重要外交决策中发挥了作用极为困难,但借助史料可以发现,至少在晚期罗马帝国的两个重要历史时刻,皇帝的决定可能受到了这种影响。

第一个历史时刻是378年亚得里亚堡(Adrianople)战役前皇帝瓦伦斯决定拒绝哥特人的议和请求。378年之役被当代学者称为罗马帝国史乃至罗马史中最可怕的军事灾难之一^{[24](123)}。在战役中,瓦伦斯麾下军队主力^{[24](137-139)[47](176-178)}损失惨重(一般认为有2万罗马士兵参战,希瑟认为约有1.5万人^{[47](181)}),瓦伦斯本人战死,参战部队损失超过三分之二^{[23](475-483)[24](140-142)}。这场惨败本可避免。在战役前夜,哥特人首领派遣使节向皇帝求和,请求皇帝允许哥特人在色雷斯定居,并许诺与帝国和平相处,但被皇帝拒绝,次日战役爆发^{[23](465-467)}。

皇帝拒绝哥特人求和的原因之一,在于误认为哥特人只有1万人^{[23](463-465)}。原因之二,瓦伦斯为独占胜利果实否定了等候西部皇帝格拉提安(Gratian, 375—383年在位)援军的提议^{[23](465)}。瓦伦斯拒绝和谈并否定稳扎稳打的作战方案,主要原因是哥特人的行动已经动摇了皇帝的权威。战前,在君士坦丁堡“人们惊恐万分,开始低声抱怨皇帝,谴责他把敌人带到了这里,在那里拖延不进,而不是立刻出兵攻打蛮族……人们众口一词地大声攻击皇帝忽视公共事务,以最大的热情喊道:‘给我们武器,我们自己会战斗’。皇帝迫于这种煽动性喧嚷,在6月11日离城出征”^{[25](117)}。对于罗马皇帝来说,率军战胜外敌并由此增强罗马命定统治世界的信念^[48]是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既然皇帝认为哥特人的军力不强,那么以一己之力尽快肃清“蛮族”的理想主义期待就会影响皇帝的决策。

第二个历史时刻是皇帝朱利安远征波斯期间拒绝和谈。综合朱利安本人的著作、晚期罗马帝国多神教徒与基督徒作家的叙事以及后世史家的分析来看,远征本身以及远征中皇帝与波斯使节的互动无疑受到了理想主义观念的影响。

在远征波斯前,朱利安撰写了《诸恺撒》(*The Caesars*)^{[49](137)}一文。皇帝在文中赞美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336年—公元前323年在位)征服波斯^{[50](385-389)}以及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 98—117年在位)击败波斯^{[50](395)}。根据尤纳匹乌斯的分析,朱利安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帝国大患,因此率军远征^{[19](39)}。阿米安努斯宣称,朱利安曾向士兵解释出征原因,宣称这是针对波斯的复仇战争,必须将波斯人彻底铲除以结束这一长期斗争,如同此前罗马人征服迦太基(Carthage)以及其他敌人一样^{[34](343-347)}。

这一宏大目标可能并非由阿米安努斯虚构的。在朱利安战死后,安条克(Antioch)著名学者与朱利安密友利巴尼乌斯(Libanius)在皇帝的葬礼演说中提及:“我们曾经期待整个波斯帝国成为罗马帝国的组成部分,臣服于我们的法律,接受来自我们的总督并向我们纳贡;我们曾经认为他们将改变他们的语言与衣着,剪断他们的头发,苏撒(Susa)的智者会将波斯的孩童培养为演说家;我们此地由来自波斯的战利品所装饰的神庙将向未来的一代又一代人讲述彻底的胜利。”^{[51](469-471)}实际上,也只有这一理想主义目标才能解释朱利安在与波斯外交互动时的强硬态度:利巴尼乌斯与基督徒史家不约而同地提及朱利安坚决拒绝与波斯使节谈判。根据利巴尼乌斯的记载,皇帝拒绝了波斯使节的和谈提议,因为朱利安认为与波斯议和就是叛国^{[51](263)}。当皇帝的侍从为波斯使节准备就任何条件进行讨论而欢呼时,朱利安宣称,讨论和平是不可容忍的^{[51](387)}。5世纪的基督徒史家宣称,波斯人多次派遣使节表示希望割地求和,但朱利安认为自己的功勋将超过亚历山大大帝,因此予以拒绝^{[25](90)}。7世纪的基督徒史家安条克的约翰认为,朱利安贪得无厌地追求荣耀以致行事过度^[52]。12世纪的史家仲纳斯批评朱利安“为声名而激动”^[53]。综上所述,在宗教事务上分别抨击朱利安的基督徒作家与赞美朱利安的多神教徒作家在论述其远征波斯时态度几乎一致,都认为他受到宏大理想(或野心)的驱使,以致拒绝与波斯使节谈判。

在后世史家中,吉本基本接受晚期罗马帝国作家关于朱利安远征目标的理想主义叙事^[54]。琼斯认为朱利安远征受到亚历山大大帝与图拉真事迹的影响^{[12](123)}。马修斯认为,任何将野心转向东方的罗马皇帝都受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影响^{[49](138)}。博尔索克称:“如同亚历山大大帝,朱利安将其目光不可挽回地转向东方。”^[55]《新编剑桥古代史》认为,朱利安远征是以亚历山大大帝与图拉真为榜样的^{[30](73-74)}。哈里斯认为,朱利安受到理念与理想的驱动,亚历山大大帝和图拉真的形象为其提供了激励^[56]。结合古今史家的记载与评价,可以得出结论,朱利安与波斯使节外交互动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其受到了理想主义目标的深刻影响。

除了瓦伦斯与朱利安之外,6世纪时查士丁尼一世对西部地中海世界的征服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重新统一帝国这一理想的影响。由于前人对查士丁尼一世重新征服地中海世界的理想主义目标有大量论述,在此不再赘述。总之,帝国理当君临大地的理想主义叙事构成了帝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意

意识形态基础，并会在适当时机经由某位皇帝对帝国与周边“蛮族”的外交互动产生影响。有时，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皇帝付出生命的代价。

三、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外交互动中的实用主义特征

在晚期罗马帝国，除了政治宣传或自我夸耀之外，理想主义叙事真正在现实中主宰皇帝决策的时刻并不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帝国政府与周边“蛮族”的外交互动具有实用主义特征。

勒特瓦克认为，在西部帝国于公元5世纪消失后，就可以将原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称为拜占庭帝国。在处理与周边“蛮族”的关系时，拜占庭帝国与罗马帝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更少动用军事力量，而更依靠以说服方式征召盟友、劝阻敌人并促使敌人彼此攻击。此外，拜占庭人在战斗中更倾向于阻止而非摧毁敌人；当帝国军队能够发起进攻并征服疆土时，外交用于迫使敌人让步；当帝国军力软弱时，帝国的生存就要依靠各类外部盟友的力量^[57]。

勒特瓦克显然忽略了罗马从共和国开始就有建立同盟、分而治之、向敌人赠礼、派遣使节迫使对手屈服的 tradition，也忽视了5世纪后期至6世纪中期东部帝国皇帝进行的各种战争。但是，他所提及的东部帝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各种措施的确存在。当晚期罗马帝国面对来自不同地区的“蛮族”时，所有“蛮族”均被视为潜在敌人，因为确实有“蛮族”不时与帝国发生冲突。考虑到帝国军事力量与资源的实际供给能力，在与“蛮族”进行外交互动时，较为灵活变通的实用主义方式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外交互动的实用主义特征主要体现在目标的明确性与有限性上。帝国与周边“蛮族”的使节来往均有明确目标，且这些目标就性质而言都是有限的。作为帝国谈判对手的“蛮族”，其目标同样明确且有限。只有双方都具有实用主义的灵活性，才能在外交互动中令双方妥协并获益。

如前文所述，即使在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发生冲突时，双方为结束战争而进行的外交互动也一般不会中断。除此之外，帝国与“蛮族”外交互动的目的还涉及经济、政治、宗教等诸多方面。在同一次外交互动中，双方的目的可能并不相同，也并不单一。

第一，帝国与“蛮族”外交互动的实用主义特征表现为具有经济目的。为绕开被萨珊波斯控制的丝绸贸易通道，查士丁尼一世曾经向阿克苏姆王国与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希米叶尔人派遣使节^{[31](193)}。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在位时，帝国官员弗洛伦提乌斯(Florentius)为了打通不列颠与高卢之间的海上通道而向“蛮族”许诺缴纳2000磅白银，“蛮族”在此次谈判中获得了经济利益，帝国则确保了食物补给通道的畅通^{[50](271-273)}。376年，大量哥特人来到多瑙河北岸^{[47](145)}。哥特人向瓦伦斯派遣使节，乞求皇帝接纳，许诺会为帝国提供辅助部队^{[23](401)}。当时廷臣认为，同意哥特人的请求可以每年节省招募士兵花费的大量金钱^{[23](403)}。在此次外交互动中，哥特人的目的是取得帝国庇护，帝国同意哥特人越过多瑙河的最根本原因是缓解边疆压力，利用“蛮族”人力资源显然也是重要考虑。这也与晚期罗马帝国吸收“蛮族”群体以补充帝国人力与物力资源的政策相吻合，其中的经济目的不应受到忽视。

匈人与晚期罗马帝国的外交互动大多具有获取帝国财富的明确目的。424年，帝国政府同意向匈人缴纳年贡350磅黄金^{[8](271)[36](40)}。根据439年至440年间达成的协议，年贡提高至700磅黄金^{[19](227)}。447年，帝国政府同意年贡增至2100磅黄金^{[19](237)[36](41)}。从帝国获取经济利益是包括日耳曼人(Germans)、匈人等在内的周边“蛮族”与晚期罗马帝国进行外交互动时的关键目的。帝国满足“蛮族”的经济目的是为了 avoid 在战争中遭受更大损失。此外，帝国有时通过满足某个族群的经济目的实行其“以夷制夷”的策略。例如，查士丁尼一世曾馈赠黄金以说服库特里古尔人(Cotrigurs)退兵，后致信长期接受帝国馈赠的乌提古尔人(Utigurs)首领，称库特里古尔人企图取代后者地位，以挑拨双方相争^{[46](160-161)}。

第二,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外交互动的实用主义特征表现为具有明确政治目的。帝国与“蛮族”的外交互动被用于确立彼此的政治关系。例如,帝国东部皇帝瓦伦斯战死后,进入潘诺尼亚(Pannonia)的部分哥特人与西部皇帝格拉提安达成协议,作为帝国的同盟者定居^{[30](102)}。382年,东部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与留在巴尔干半岛的哥特人缔结和约^{[27](85)[28](2)[29](456)},和约规定,哥特人可以在帝国境内定居,同时应当加入帝国军队^{[5](158-159)[58]}。

公元5世纪后期,控制意大利的“蛮族”将领奥多阿克(Odoacer)派遣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面见帝国东部皇帝芝诺(Zeno, 474—475年在位, 476—491年在位),要求芝诺授予自己统治意大利的合法权力,而芝诺则在致奥多阿克的回信中称其为帝国的显贵^[59]。东哥特王国统治者提奥德里克多次向东部皇帝致信或遣使的目的也是确立双方的政治关系。497年,帝国与提奥德里克派遣的第三次使节团签订条约,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I, 491—518年在位)同意将之前奥多阿克呈交的西部皇帝宫殿饰物送回意大利^{[4](80-83)}。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与提奥德里克之间的务实外交开启了直至查士丁尼一世在位初期帝国与东哥特王国相对和平的时代。

晚期罗马帝国与其东部主要对手萨珊波斯帝国同样存在相对友好的关系,且这种关系也是通过具有明确政治目标的外交互动确立的。例如,东部皇帝阿尔卡迪乌斯(Arcadius, 395—408年在位)去世前,曾担心其独子狄奥多西年幼而无法保护自身的安全与皇位,在遗嘱中任命波斯国王叶兹底格德一世(Yazdgerd I, 399—420年在位)担任狄奥多西二世的监护人^{[31](9-11)}。这一安排必然事先得到了叶兹底格德一世的同意。

狄奥多西二世即位时的处境与阿尔卡迪乌斯初登皇位时极为相似,皇帝年幼,权臣掌管政权并导致政治危机^[60]。因此,阿尔卡迪乌斯的安排符合其子的政治利益。在叶兹底格德一世在位时期,两大帝国基本保持和平共处^{[61](23)}。该“托孤”事件也被当代学者认为体现了双方关系进入以合作为主的阶段^[62]。

第三,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外交互动中的实用主义特征体现为具有实际的宗教目的。随着罗马帝国逐渐基督教化,晚期罗马帝国皇帝被视为全世界基督徒的保护者,因此,帝国在与周边“蛮族”的外交互动中也会关注边疆事务之外的基督徒事务。尤西比乌斯提及,君士坦丁一世希望保护波斯基督徒的利益,并在国书中表达了关切^{[7](158)}。不少学者认为此信的确存在^{[63](52-53)},勒米拉则认为无法确定该信的真实性^[33]。史密斯认为,无论信件本身是否存在,4世纪后,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的基督徒都相信信件的真实性^{[63](17)}。该信关注波斯国王辖下基督徒的福祉,呈现的是君士坦丁一世作为帝国之外基督徒保护者的形象以及基督徒均为罗马皇帝子民的观念。这种形象与观念的确立,导致宗教成为晚期罗马帝国与“蛮族”外交互动时所关注的问题之一。

根据苏格拉底的记载,叶兹底格德一世的继承者为瓦拉拉内斯(Vararanes)^③,据说他“残酷地迫害那里(萨珊波斯)的基督徒。由于这种压迫,他们被迫逃离家乡,向罗马人寻求庇护……正巧在同时,发生了另一件点燃罗马人对波斯人怒火的事。也就是说,波斯人拒绝送回从罗马人中雇佣的金矿劳工,他们还抢劫罗马商人。这些事件造成的恶感由于波斯基督教徒逃入罗马领土而大幅增强。波斯国王立即派使节前来追讨逃难者。但是罗马人决不交出他们……他们宁愿选择与波斯人重新开战,而不是让基督徒悲惨地毁灭。因此条约破裂,一场残酷的战争随之而来”^{[25](162)}。后来,战争陷入僵局^{[35](42)}。经过使节来往,双方在422年签订和约,规定授予居住在萨珊波斯的基督徒以宗教自由,同时帝国为高加索地区的防御向萨珊波斯提供经济援助^{[64](137)}。除了在440年至441年间波斯军队曾短暂入侵帝国的势力范围^{[28](17)[61](23)}之外,直至6世纪初,422年和约确保了两大帝国的和平共处^{[64](137-138)}。

虽然这场战争体现了罗马一波斯的长期战略相持关系,但是从战前的使节往来与最后的和约条款来看,晚期罗马帝国皇帝确实将自己视为帝国内外所有基督徒的保护人。因此,在波斯使节要求交还逃亡者时,皇帝才会断然拒绝,并在和约中明确要求保护波斯基督徒的宗教自由。不过,从422年和

约来看，晚期罗马帝国皇帝作为基督徒保护人的观念并未无限膨胀，仍接受了环境赋予的限度。和约条款既包括宗教问题，也涉及地区防御问题，体现了外交互动目标的多样性。

四、结语

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保持着密切的外交互动关系且具有相当成熟的外交机制。这种外交机制在共和国时期与帝国早期便已发展良好。从更为纵深的时间角度来看，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的外交互动是地中海世界文明与周边地区关系的一种常态。在外交互动中，晚期罗马帝国的外交机制是以皇帝为核心的，外交事务主要由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相关官僚机构负责，地方官员、将领或主教也可参与外交活动，皇帝是外交事务的最高决策者。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的外交互动同时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与实用主义特征。就理想主义色彩而言，“世界”帝国观念在帝国精英阶层中长期存在，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统治者的外交决策。就实用主义特征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晚期罗马帝国与“蛮族”的外交往来存在明确的指向性，目标在于实现具体与有限的经济、政治或宗教等目的。

注释：

- ① 本文的“晚期罗马帝国”指的是从戴克里先(Diocletian, 284—305 年在位)即位至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 527—565 年在位)去世的历史阶段。
- ② 拜占庭帝国是后世学者赋予罗马帝国东部地区政权在中世纪的后继者的称谓。就当时而言，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臣民，始终自称为罗马人。
- ③ 即巴赫拉姆五世(Bahram V, 420—438 年在位)。

参考文献：

- [1] EILERS C. Diplomats and diplomacy in the Roman world [M]. Leiden·Boston: Brill, 2009.
- [2] 陈志强. 拜占廷学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291.
- [3] BAYNES N H, MOSS H St L B. Byzantium: An introduction to East Roman civilization[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8: 306.
- [4] HAARER F K. Anastasius I: Politics and empire in the late Roman world [M]. Cambridge: Francis Cairns, 2006.
- [5] HEATHER P J. Goths and Romans: 332—489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 [6] 张楠, 张强.《奥古斯都功德碑》译注[J]. 古代文明, 2007(3): 10—24, 111.
- [7] EUSEBIUS. Life of Constantine[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
- [8] BURY J B. History of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Vol. I[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58.
- [9] VICTOR. De Caesaribus[M].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0] PHARR C.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 [11] BOAK A E R, DUNLAP J E. Two studies in late Roman and Byzantine administration[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4.
- [12] JONES A H M.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A social,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 Vol. I[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4.
- [13] FRIER B. The codex of Justinian: A new annotated translation, with parallel Latin and Greek text, Vol. III[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3035.
- [14] CAMERON A. The last pagans of Rom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644.

- [15] WIENAND J. Contested monarchy: Integrating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fourth century AD[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409.
- [16] CASSIODORUS. Selected variaae of Magnus Aurelius Cassiodorus Senator[M].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2006: 98.
- [17] JORDANES. 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M]. Cambridge: Speculum Historiale, Reprinted, 1960.
- [18] BURNS T S. Barbarians within the gates of Rome [M].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9] BLOCKLEY R C. 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Eunapius, Olympiodorus, Priscus and Malchus, II [M]. Liverpool: Francis Cairns, 1983.
- [20] SHEPARD J, FRANKLIN S. Byzantine diplomacy [M]. Aldershot: Ashgate, 1992.
- [21] PHILOSTORGIUS. Church history[M]. Leiden-Boston: Brill, 2007.
- [22] MARCELLINUS A. History: Books 14—19[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 [23] MARCELLINUS A. History: Books 27—31[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vised and Reprinted 1986.
- [24] KULIKOWSKI M. Rome's Gothic wars: From the third Century to Alaric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25] SOCRATE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 [M]. Grand Rapids, Michiga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57.
- [26] SOZOMEN.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zomen[M]. Grand Rapids, Michiga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57.
- [27] ZOSIMUS. New history[M]. Sydney: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 1982.
- [28] MARCELLINUS. The chronicle of Marcellinus[M]. Sydney: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 1995.
- [29] SABIN P, WEES H. V, WHITBY M.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warfare, Vol. II: Rome from the late republic to the late empir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30] CAMERON A, GARNSEY P.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II: The late empire, A. D. 337—425[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31]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Books I—II[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1996.
- [32] MILLAR F. Emperors, frontiers and foreign relations, 31 B. C. to A. D. 378 [J]. Britannia, 1982(13): 1—23.
- [33] MILLAR F. The Roman near east, 31 BC—AD 337[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77—178.
- [34] MARCELLINUS A. History: Books 20—26[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1986.
- [35] GREATREX G, LIEU S N C. The Roman eastern frontier and the Persian wars, Part II: AD 363—630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36] CAMERON A, WARD-PERKINS B, WHITBY M.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V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37] VANDERSPOEL J. Themistius and the imperial court [M].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 [38] OROSIUS. 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M]. Washington, D 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64.
- [39]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against the pagans: Books I—II[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2000: 3.
- [40] SIDONIUS. Poems, letters I—III[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 [41] CONSTANTINE.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M]. Washington, District of Columbia: Dumbarton Oaks, 1967: 45—47.
- [42] JULIAN. The works of the emperor Julian, Vol. I[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13—15.
- [43] 奥古斯丁. 上帝之城: 修订版[M]. 王晓朝,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中译本序 17—19.
- [44] SALVIAN. On the government of God[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0.
- [45] BELL P N. Three political voices from the age of Justinian[M].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09.
- [46] AGATHIAS. The histories[M].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75.
- [47] HEATHER P.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A new history of Rome and the barbarian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48] DRINKWATER J F. The Alamanni and Rome 213—496 (Caracalla to Clovi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42.
- [49] MATTHEWS J. The Roman Empire of Ammianus[M]. London: Duckworth, 1989.
- [50] JULIAN. The works of the emperor Julian, Vol. II[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 [51] LIBANIUS. Selected works, Vol. I[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1987.
- [52] JOHN. Ioannis Antiocheni fragmenta quae supersunt Omnia[M]. Berolini et Novi Eboraci: Walger de Gruyter, 2008: 367.
- [53] ZONARAS. The history of Zonaras: From Alexander Severus to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the Great[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176.

- [54] GIBBON E.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M]. Holicong: Wildside Press, 2004: 506–507.
- [55] BOWERSOCK G W. Julian the apostate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06.
- [56] HARRIES J. Imperial Rome AD 284 to 363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2: 313.
- [57] LUTTWAK E N.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M].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5–7.
- [58] LEE A D. From Rome to Byzantium AD 363 to 565[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3: 37.
- [59] THOMPSON E A. Romans and barbarians: The decline of the western empire[M].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66–67.
- [60] 董晓佳, 刘榕榕. 反日耳曼人情绪与早期拜占廷帝国政治危机[J]. 历史研究, 2014(2): 108–125.
- [61] DARYAEE T. Sasanian Persia: The rise and fall of an empire[M]. London· New York: I. B. Tauris, 2009.
- [62] 马锋. 蛮族中的文明人: 5—6 世纪拜占廷人对波斯人的认识: 以拜占庭与萨珊波斯两次托孤事件为考察中心[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50(4): 138–145.
- [63] SMITH K. Constantine and the captive Christians of Persia [M]. Oakland,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 [64] DIGNAS B, WINTER E. Rome and Persia in late antiqui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Diplomatic interaction mechanism and its features of the late Roman Empire with the surrounding “barbarians”

DONG Xiaojia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Roman Empire, the empire had a long-term and wide diplomatic interaction with the surrounding “barbarians”. In such interactions, the emperors and the chieftains or kings of the “barbarians” generally played the central roles, who mutually constituted the axis of the diplomat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late Roman Empire and the surrounding “barbarians”. At the same time, the magistrates, the generals in the frontiers, the bishops of the Roman Empire and the generals or officials of the regime of the “barbarians” were also participants in the diplomatic activities. On the one hand, their correspondences and negotiations were a significant factor to the diplomatic interac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valid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se correspondences and negotiations were limited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uthority. And the core feature of the diplomatic interactive of the late Roman Empire with the surrounding “barbarians” was the coexistence of the idealism and realism. In most cases, the diplomatic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m were manifested in the strong color of pragmatism, but idealistic diplomacy, from time to time, exerted effects, to a certain extent, on the empire’s fate and historical progress.

Key words: late Roman Empire; “barbarians”; diplomatic mechanism

[编辑: 苏慧]